

从“探险”到“休闲”

——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的价值认知研究

何元春¹, 陈媛媛²

(1. 厦门大学 体育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华北电力大学 体教部, 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 简要概括了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行为及其方式, 台湾民众对登山活动开展的认可度及其参与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 以体育活动为主体性的活动, 其实, 指涉的就是一种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就是要达到身体动员和精神动员的双重效果; 体育不是简单“类”现象, 而是应对来自各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反应。因而, 当前要研究殖民地体育, 就必须把体育放在日本(西方)对台湾(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实行宰制以及反宰制的关系中进行。

关键词: 登山; 探险; 健身; 休闲; 体育史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0)05-0052-04

From “adventure” to “leisure”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HE Yuan-chun¹, CHEN Yuan-yuan²

(1. P. E Dept. of Xiamen Univ., Xiamen 361005, China;

2. P. E Dept.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 Zhengzhou 071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d the activities of mountaineering in Taiwan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to explore into the colonial culture in the mountaineering activiti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articipation of mountaineering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was to see that sports in the colonies involved ideological formation favoring the colonial governance,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Sports then had become complicated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s. Therefore, to study the colonial sport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aiwan (the third world country), the control of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neo-colonialism as well as anti-control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mountaineering; exploration; fitness; leisure; sports history

登山是与人的身体经验息息相关的一项体育活动,但在“立国旗”的年代里,首登就是征服,征服代表的就是成功。所以,殖民语境下,这种以充满“插国旗”式的征服思想色彩表现在登山活动之上,它纯然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产物。

正因为前期相关研究鲜有所见,所以,本文以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为个案,探讨殖民主义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与殖民地体育互动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希望借助这一体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能够给

中国体育史包括殖民史等研究视角的拓展和延伸带来一定的启示。

1 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发展脉络

人与山岳的关系可追溯至远古,但古代人类总认为山岳是魔鬼或众神居住的地方,因而,早期登山活动开展的目的不在登山活动本身,而只能是达成迁徙、宗教、战争或通商等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

1786年,欧洲阿尔卑斯最高峰被登顶,从而也使得登山活动开展逐渐脱离了以宗教信仰为其主体的现状,取而代之的则是欧洲所建立起来的近代登山活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追求西方式的文明与进步,并以西方先进文化作为典范,所以这种既具挑战性、新奇性、冒险性,也十分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性格的身体运动

收稿日期: 2010-03-25; 修回日期: 2010-04-23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A036)。

作者简介: 何元春(1973-),男,福建厦门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体育人文社会学。

文化——“近代登山”，在一波波的西方浪潮当中，不无例外地也被介绍和引进至西化中的日本，包括它的第一个殖民地——台湾^[1]。

山地，特别是高山，自然环境特殊，更是蕴藏着自然奥秘和丰富资源的宝地。因而，以经济掠夺和政治征服为主要目的的登山活动，在这一刻起就被强势地带入到了台湾社会，倍受在台日本人的关注和重视，所以，从“野蛮的化外之地”到“探险”，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不过，当居住在较高纬度的日本人进入到了亚热带的台湾，其殖民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就在殖民者进行“理番事业”的同时，在台日本人同样也遇到了西方殖民者殖民统治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遇到的同样问题，那就是“风土驯化”和“风土适应”问题，于是，一直被视为“富源”之所在且具经济价值的台湾高海拔地区，在“高海拔利用论”的背景下，也从“探险”活动本身摇身一变成了在台日本人“风土适应”和“健身”补救的一块风水宝地^[2]。

当然，殖民统治期间，日本侵略者除了疯狂地掠夺经济资源之外，他们也始终把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当作永久霸占台湾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就在登山环境得到了逐步优化，特别是在“五年理番事业”取得了成功之后，登山活动开展又通过学校“体育”的形式，水到渠成地变成了日本殖民者“文化同化”的一项重要发展事业^[3]。换言之，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其价值认知再次发生转变，登山活动又变成了殖民当局“文化同化”和“皇民化”教育的重要一环。

日据后期，就在日本追求文明脚步的同时，休闲意识随之也进入了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台湾，于是，各种登山组织也于大正年间纷纷成立。至此，无论是举办动态的登山活动，还是静态的登山展示，均使得登山活动本身在台湾获得一个较为清楚的图像，更让登山意识逐渐明显，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原为登山游客或者是学生所独享的登山领域，在“官领民从，自上而下”的状态下，一跃也成为了台湾“全民运动”、“新国民运动”及“休闲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日据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最终又走向了“休闲化”和“娱乐化”的发展道路^[4]。

2 殖民话语分析：对“转手的”近代登山文化的改写和重写

2.1 促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成为了现代化的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强权，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尚属于“早熟的帝国主义”^[5]。所以，日帝据台之后，便立即展开了一

系列的“为日本独占资本在台湾顺利发展”所必须的基础工程建设，如，人口普查、土地调查整理、林野调查、旧惯习俗调查等^[5]。于是，台湾历史的命运，包括登山活动开展，也便在这样的历史变局当中被迅速地整编到了日本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并被强势地带入到了台湾社会。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登山活动开展事实上也变成了殖民当局用以补强殖民资本主义之“当事人资格”的重要一环。

2.2 塑造“有用人才”，进而达到身体及精神动员上的双重支配效果

如，Geoffrey Caldwell指出：“运动的最大意义，在于藉此建立人民对国家的认同……”^[5]所以，以体育活动为主体性的探讨，其实，指的就是一种有利于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是要达到身体动员和精神动员的双重效果。

如，国语教科书、地理课本以及其它的辅助教材，也陆续地出现了以登山或以登山活动为主题的相关课文，课文名义上在讲台湾的山峰，但真正目的不在此，而是在不断地“灌输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借以彰显日本人的权威，或直接颂扬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所带来的丰功伟绩^[6]。

当然，文化同化仅靠教室内的、平面式的文本宣传，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要成为“日本人”，仅具备内在的信仰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得配合一连串的富有象征性的一些身体语言和身体行为加以强化和巩固。所以，在寒暑假实践类的登山活动过程当中，学生们往往还要穿上统一的校服，背上统一的小背包，手里还要拿着日本小国旗，登上高山之颠，在军官的带领下往往还要高呼“天皇万岁，万万岁”，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或参拜新高神社、合唱该校校歌、拍纪念照等等^[7]。

1938年，日本、台湾均进入了“战时体制”，可以说这时期的教育制度更是强化了“皇道思想”及军国主义。因而，登山活动在教育部门、教育单位中倍受肯定，其教育目标同样也是以“练成皇国民”为主要目的。所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重视^[8]。

2.3 登山实践活动本身，也暗含“治理知识上的一种空间政治”

登山活动实践本身，如，地图绘制、勘测、测量和人口普查等，也暗含着“治理知识上的一种空间政治”。

有关人口普查部分，日帝据台之后，台湾民众一共被清查有7次之多，全面调查的结果，不仅可以将每一个人从杂乱无章的群体中“独立”了出来，而且，对殖民者而言，每一个个体一旦有了清楚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就自然地要加以注意^[8]。

同样,就殖民地图而言,姚人多在《认识台湾:知识、权利与台湾在台之殖民治理性》一文中也给出了最佳的理由和注脚。“当我在土地调查局翻阅各种不同的地图和土地帐册时,发现这个岛上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落,其确切位置都已被确切地掌握……因此只要有一支铅笔和这样的地图,我们便可以轻易地计算出台湾的地形和地势,就象我们在看自己的手心一样简单”^[9]。包括日据时期台湾“新高山”与“次高山”之命名,也均为日本皇室所为。“新高山”之命名,是日本政府将富士的概念延伸到台湾山岳的一个意象,以求与富士山产生关联。同样“次高山”之命名,也是以新高山为基准的,于是,原先的日、台三座高山彼此连接,均被视为“一视同仁的帝国现象”的一个延伸。

所以,通过如此的命名方式也不难看出,由山岳的命名而成立地域概念,其实也进一步彰显了日本皇室的神威和隐含着的对权力的一种掌控。

3 台湾民众对登山活动开展的可度及其参与状况

3.1 艰难互动

由于传入山地的主要是日本殖民主义文化,所以,在早期登山活动的开展过程当中,来自汉民族的反抗在所难免,来自高山上的原住民的反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如斯皮瓦克在其《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所言,“属下是不能说话的,在‘大人’制定的规则给‘孩子’创造的背景工程还未竣工之时,属下是不能乱说话的”^[9]。所以,在强势的殖民主义作风背后,台湾本地人的声音自然也就遭到了消解,于是,在殖民政府大力推行“五年理番事业”的成功氛围当中,山岳地区的可利用性,不但在成功地转换成为“避暑胜地”、“享受自然”、“强身健体”的正当而又合理的形象外,登山活动自身也逐步地赢得了台湾民众的认可和肯定。

当然,台湾登山活动开展,要想真正赢得民众的认可又远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对台湾人而言,体育也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完全可以与日本人同台公平竞争的机会,若能掌握这样的机会,更可以通过体育竞争的获胜,来挽回一点民族自信心。因而,在日、台双方各有所图的情况下,台湾登山活动的蓬勃开展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日据后期,台湾人主动而又积极地参与登山活动这个事实,已散见于当时的许多资料当中,并显示了部分台湾人参与登山活动的普遍化趋势。

林玫君教授在《日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登山活动——以攀登新高山为例》一文中所提到:“台湾人对于身体能力的自信,也表现在与日本人相互较劲的场景上……台北日新公学校的李发明,在学校举办草山

远足时,因见到了旭小学校的日籍学生一同前往,便激发出不甘落后、不做弱势群体的内心想法……”^[10]同样,根据台籍学生姜义镇的回忆,似乎也反应了当时学生参与登山活动感到无比骄傲的心境:“……每年一次的远足,不但让学生非常地期待,更让他们体会了真正的‘远走’,在我的记忆当中,没有一个人喊腰酸腿痛走不动,个个健壮无比,所有的疲惫也都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则是兴奋、愉悦和满足……”^[11]所以,从当时的登山活动开展状况来看,不仅部分台湾人已经可以接受登山,而且还大声呼吁和奖励体育,更期望台湾人在各种竞技运动项目中取得佳绩。

总之,就登山活动而言,尽管登山等相关体育活动(如棒球)已是殖民主义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殖民政府身体动员和精神动员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就登山活动本身而言,这种潜伏的“规训”力量并无弊害。相反,登山活动的健身、休闲和娱乐等功能也确实还是存在的,这一点或许也是日据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逐步赢得台湾民众的认可和肯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2 主体性缺失

不可否认,日据后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有渐为蓬勃之势。但是,台湾人在登山活动过程中其主体性又始终是缺失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基调是因为:

日据期间,台湾社会结构的最大改变莫过于日本人与台湾人被截然地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以,台湾民众纵然认同日本人,进而参与登山活动,但他们始终也无法解除日本人的藩篱和限制。另外,从媒体和登山文本来看,登山活动也终以日本人的国家意识为前提。凡具备学科理论的登山活动内容均由日文来书写,甚至连文字和图像等,也全由殖民者所垄断。在登山活动进行过程中,大部分的原住民曾是登山界的无名英雄,但对原住民而言,他们的工作除了换取金钱和物质上的代价之外,并未得到太多的应该得到的尊敬与肯定。再加上,高山上原住民根本就没有文字记载,登山活动的相关事宜也只能靠口耳相传^[12],因此,台湾山岳“首登”的荣耀,在原住民的臣服和牺牲下,全部归于日本殖民者所有。

总之,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并不顺利,它始终有一个艰难的互动过程。登山活动开展过程中,台湾人自己的形象,不论是作为反抗者,抑或作为学习者,他们自始至终也只能作为“帝国恩惠”的光明底色的一种陪衬。

4 殖民主义文化与殖民地体育互动关系及后续影响

4.1 殖民地体育属性

诚如李欧塔(Lyotard 1988)所言:“声音的世界是

事件的世界,音乐旋律本身的传唱倒没有被篡改,但在歌词所传达的文意上,经过不同的主体加工,却又完全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以满足不同人群抑或不同团体的不同需求。”^[13]

其实,殖民地体育运动开展同样如此。就殖民者而言,体育运动开展具有创造“臣民”意义上的顺从作用,但对被殖民者而言,体育也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完全可以与日本人同台公平竞争的机会。因而,经不同主体不同的加工之后,台湾登山活动开展不仅促成了台湾人参与登山活动的心理转折,同时也变成了台湾人民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

总之,体育既是一种“硬”的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软”的文化形式。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不全是被迫行为,它同样存在着一个各取所需、各有所图的同构过程。

4.2 殖民主义文化在体育中的渗透总披上“道德外衣”

首先,台湾人总被贴上了诸多的负面的标签,如肮脏、野蛮、粗俗、清国奴、有“猎人头”的坏习俗等;其次,“新高山”、“次高山”如此的命名方式等,也都不难看出殖民当局完全是以一种“刮去重写”的方式,对台湾进行了再诠释与再建构。日据后期,通过“台湾博览会”、高山上的“国家公园”及其“休闲娱乐场所”的增设与宣传,台湾登山活动开展反而变成了殖民当局颂扬殖民统治合理性、优越性和正当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身为国会议员的竹越与三郎本人,在1934年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后,也曾骄傲地宣称:“日本完全可以用它在福尔摩沙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来证明自己已经跻身于世界殖民强权之林。”更为重要的是,在与西方殖民主义霸权比较之后,竹越与三郎还认为:“如果不把我们缺乏资本及缺乏强有力的大商人这些莫大的缺陷考虑进去的话,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完全可以堪称为卓越不凡……”^[14]

总之,透过体育的这种“特殊修辞”,我们不难发现,对台湾人而言,殖民统治及登山活动开展,台湾人始终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殖民主义文化在体育中渗透完全是统治手段的一种软化,也是统治策略的一种调整和重新包装。

4.3 殖民地体育不是简单“类”现象,而是应对来自各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反应

如上文所述,殖民地体育活动开展不全是被迫行为,同样也有来自“他”、“我”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图的一个同构过程。所以,体育不是简单“类”现象,而是应对来自各种体育和非体育挑战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政

治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之强烈、影响之深远恐怕也远远地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所以,解读了日据期间台湾登山活动背后的“殖民现代性”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印度人为何在观看板球比赛时总热血沸腾……1959年容国团夺取世界冠军后,为何举国沸腾,而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气概,为何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至今听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其实,这一点,实质上也是当前大多第三世界国家始终对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总持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殖民”、“后殖民”绝对不是一个标签,可以由我们随意来张贴,殖民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已持续地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活动开展,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等。所以,当前我们要研究体育,要研究中国体育,就必须把中国体育放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长达百年的体育发展史中”去考察。

参考文献:

- [1] 林玫君.台湾登山史研究[M].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 [2] 李艾丽.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J].学术论坛,2004(2):146-147.
- [3] 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320.
- [4]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5] 林玫君.日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登山活动[J].国立台中技术学院人文社会学报,1999(6):179-183.
- [6] 柴田廉.台湾同化策论[M].台北:晁文馆,大正12年.
- [7] 井出秀和太.台湾治绩志方[M].台北:台湾日日新报社,1937.
- [8] 蒯子馨.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M].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6.
- [9] 夏黎明.清代台湾地图演变史——兼论一个绘图典范的转移历程[M].台北:知书房,1996.
- [10]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M].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
- [11] 陈其澎.日治时期殖民现代性的研究[C].台北:文化研究会2003年年会,2003.
- [12] 森丑之助.生番行脚:森丑之助的台湾探险[M].杨南郡译.台北:远流,2000.
- [13] 蒋淑英.台湾府志[J].台湾历史文献周刊,1993,19(3):731-733.
- [14] 杨坤.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EB].中国网,2005-08-29.